

长江人文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

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

吴桂美◎著

HAO ZU SHEHUI DE WENXUE ZHEGUANG
DONGHAN JIAZU WENXUE SHENGTAI TOUSHI



长江人文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

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

吴桂美◎著

HAO ZU SHEHUI DE WENXUE ZHEGUANG
DONGHAN JIAZU WENXUE SHENGTAI TOU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吴桂美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07-08099-8

I. 豪... II. 吴...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东汉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595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刘 鹏

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
——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
吴桂美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099-8/K·95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汉家宫阙动高秋”

前些天，接到吴桂美电子邮件，她告知我，其博士论文修改就绪即将出版，希望我作个序。我让她把电子文本发过来，表示阅读过修改部分后，看看能写点什么。从稿本加工润色的情况来看，吴桂美的学业又有所长进，她不仅对答辩委员会及相关专家的指点多有汲取，而且把我给她出的思考题——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给东汉文史重新定位——做了诸多探求。掩卷而思，吴桂美来穗读书的往事历历在目，其拾级而上的过程正可谓循序渐进的序言。

吴桂美是恩施人，苗族，人品端正，好学乐群，是我所带研究生中很有人缘也颇有团结精神的优秀青年。她曾师从湖北大学何新文先生攻读先唐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东汉崔氏家族文学研究。何先生博学善教，雅人深致，给吴桂美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提起在何先生处读书的岁月，吴桂美如回味陈年佳酿，欣欣然而不忘。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今不少年轻的博士，提起自己的成长历程，一味讲博士生期间的导师如何好，而对于硕士生阶段的导师则置诸脑后，在师承关系上猴子掰苞谷式的忘性多少有失厚道。也许恩施的民风 and 苗族的习俗都很有人情味，吴桂美尊师重道，让人有“礼失求诸野”的感慨。

中国古人讲教学相长，这是不易之定论。一个导师指导学生的过程，也是自己深入学习的过程。向古人学，向同行学，向学生学，向历

史学,向社会学,所谓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给学生的论著作序,实际上也是反思师生教学过程的一个契机。重读吴桂美的博士学位论文,回顾她读博的经历,有以下几个方面记忆犹新。

其一是“先器识而后文章”。我指导研究生比较严格,要求学生和我一样,把自己看成愚钝的初学者,主张勤苦,强调“笨鸟先飞”。因而入学伊始,我就与吴桂美多次商量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她起初想继续作东汉崔氏家族文学。我劝她不要局限于这个聚焦点。原因很简单,崔氏家族的文学人全部加起来,也不足以形成一定的局面。在常见的博士生论文中,有些选题很大,做好的不多,要么空疏,要么是流水账,要么是摆短钉。有些选题小,往往容易得手。所以有些睿智的导师索性提出“入小出大”的方法,即入口要小,出口可大。这个办法是很精明的选择,小则便于守时,便于驾驭,便于精深;但是小也有小的弱点,形制小则格局蹙,资料少则言辞孱,其结果是出口即便想大,也困于势单力薄。我赞成章学诚的观点,“士必先器识而后文章”。因材施教,器识第一。器是格局,包含品性、气质、胸襟、能耐、担待。识是见地,囊括悟性、眼界、洞察、敏锐、灵机。学者器不可小,小则难免雉窄风苑,就算亨通,也不足成事。学者识也要大,大则有如虎走平阳,即便坎坷,定能够脱困。器与识,缺一不可。有器无识,失之迂腐。有识无器,耽于虚花。器大识卓,便是学中俊彦。古来高师,无不重视器识。给学子拨手启蒙,器局首当其冲。刘勰说得好:“规略文统,宜宏大体。”我的看法是拓展博士生的格局十分重要。虽然说因人设教适体裁衣是常理常法,然而博士生在读博期间不经受一点有难度的训练更待何时。关于博士研究生的选题,器局还是适当大一点为佳。因此,我通常的做法主要用心于研究生的潜在器识开发,而选题就是最能塑造格局的环节。我给吴桂美提了一个建议,将阅读范围扩展到整个东汉文学方面,尽量把思想触角伸向诸多家族的较大的视野。给自己一点大气,不要仅仅把眼光拘泥于能否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吴桂美后来

的努力,说明这个方法还是比较中肯的举措。跳出了崔氏圈子,东汉文学立刻呈现出天开地阔的大景观。

其二是从史学来看文学,力求文史互补。在第一个学期末,吴桂美的研究基本上定点,大致范围是东汉家族文学。我与她商定的主题是探讨东汉文学的家族特征及其社会文化生态。这个主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要求,那就是史学功底。后来我给她提炼出的论文题目,《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就是充分考虑了从史学看文学,尽量推进文史互补的学术理路。从20世纪初到现在,“文学是文学”成了强音。研究文学的人多少也牵挂一些历史背景,但牵挂的目的、尺度和侧重点均落在“为了文学”或“伸张文学”的单一向度。我给吴桂美的建议是“文史一体双观”。一体,是文史合一,凸显的是“文史不分家”的古训。双观,是两面投射,强化的是“文史相还原”的互补。换言之,把历史和文学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相互阐发,分如双观,合则一体。表面上看,“还原”二字似有“自负”之嫌,百分之百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在学术的深层,这个字眼蕴涵了中国古人关于“文史不分家”的理念。前人在这方面早有创辟,陈寅恪先生的史诗互证,就可以称作一体合观的研究方法。我们今天提出对文学与史学一体双观,目的就是为了使文史交叉互证互补,实现一种史实与情志的吻合,生态与理路的还原。东汉文学的主体大都出自大家族,而东汉的大家族都是豪门大户。抓住东汉家族文学的豪族基础,就便于揭示东汉文学的生态特点。在历史的土壤中找文学的根须,即便笨拙,也不失实在之长,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安排爪牙也惊人。相比较而言,用历史证文学,要比用文学证历史更为踏实。吴桂美在这个方面锲而不舍,用功甚深,从史学看文学,同时也从文学看史学,在文史互补的过程中,为我们展示了东汉文学的家族性演变过程。对于东汉文学来讲,她的辛勤劳作,无疑是苦心孤诣的返本寻源,踏实细致的笔墨耕耘,勾勒出了一幅颇有历史说服力的文学画卷。

其三是经文史而通义理。这是我对吴桂美提出的强其所难的要求,实际上也是我与所有研究生共勉的学术执著。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由文而史,且通义理,把文史哲融通的深刻见解渗透在每一篇文章中,熔铸在一本书中,凝聚在一个标题中。虽然他的义理与今人所说的哲学还不能等同,但是他的前瞻性和创造性足以让我辈敬仰。章学诚开辟的路径,不仅为沉埋考据的乾嘉学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而且让思辨相对疲软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有了努力的方向。在中国的传统学术背景中,说“文史不分家”,没有多少人跟你较劲,《尚书》如诗如歌,《左传》声情并茂,《战国策》不啻小说,《史记》完全称得上史诗,这些个亦文亦史的文本,让人想把二者剥离开来都非常艰难。史学家为之苦恼,而文学研究工作者则从中受益匪浅。如果你进一步说“文史哲不分家”,说说可以,一旦你作一篇文史哲不分家的论文,恐怕毕业都会成问题。专家们会说你出格,同行们会说你异类,相关学科都会腹诽你离经叛道,甚至有人会说你非驴非马。在西方的研究生培养中,老师鼓励跨学科,而在我国的文类研究生培养方面,你只可小跨——如文史结合,却不可有大动作。各种评审关卡是很难通过的,至于说毕业后申报个课题之类,那会产生连带的麻烦。西方有些国家,如德国和法国,每5年会出现一批融通文史哲的中青年学者,每10年会出一批震动国际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这种现象实在与学术界、高教界和广大文化层的“松土施肥”息息相关。这绝非政治性原因,而是学术成熟度使然。吴桂美在夯实文史的基础上,向义理努力,向哲理突进,在这方面下的工夫不菲。我知道她有多艰难,撰写这篇论文,几达殚精竭虑的地步。但是这种训练将使她终身受益。虽然她的学位论文还称不上文史哲理超迈,但是其中对东汉家族文学原委考察之擘肌入理,脉络梳理之条分缕析,概念剖判之清楚明快,行文层次之环节紧凑,都与她在理论学习方面的刻苦钻研密切关联。

对于一个愿意以学术为职志的青年学子,我的期盼自然要高出其他学生。我希望吴桂美能有大量的文献阅读,她做到了,举凡《尚书》、《论语》、《诗经》、《左传》、前三史以及部分西方文史著作,她都认真研阅,有的还做了笔记。我也希望她在思想方面能有超常的发挥,有些方面她做到了,如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从先秦至东汉末年家族演变的轨迹,资料翔实地展现了东汉家族与文学在文教化演进中的转变过程,大胆地论述了东汉文学的特征和“文学自觉论”等相关问题,诸如此类的学术发掘,都能见出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才气以及对学术的热爱和投入。

吴桂美的不足之处也是不应回避的话题。她对西方文学史、文明史、史学史相当生疏,对中外哲学类的著作读得仍然嫌少,因而对东汉社会和历史的性质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尚未能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我在给她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时,曾希望这本论文对东汉史提出别开生面的新观点。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责任,必须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对两希文明、罗马帝国史和印度古代史相当熟稔,才能与东汉社会史进行比较。我一直认为,东汉时代之中国,不完全是一个封建社会,弄清这一点非常有趣,也非常有价值。我的有关思想,她还无法展开和深化。三年读博,时间之短暂也不容她超量浏览。知识结构的改造还有待继续努力。此外,作为东汉家族文学研究,这本论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有关了专家的好评,但是非家族文学如何在家族文学中穿插定位,也需要做相当的研讨。这一点已经越出了本论文的范围,或可作为作者的新课题来开发。博士研究生有毕业之日,但是学术求索如太空航行,永无际涯。

当我们披阅《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之时,仿佛又看到了东汉时代的豪强林立,民生艰难,又看到了家族文化的诗情摇曳,文思浩淼,又看到了一个当今青年学子在东汉豪族社会的文教化涡流中鼓槳击水,掬光采风,有道是:

汉家宫阙动高秋，
豪族兴递似江流。
史坛煌煌藏龙凤，
文苑离离牧马牛。
东西位定乾坤转，
南北情迁风雅秀。
凭谁折取蟾宫桂，
笑看吴刚醉美酒。

“汉家宫阙动高秋”，这是唐人赵嘏《长安秋望》中的名句，此处喻指东汉时代大汉帝国江河日下，一如高秋晚照，云物凄凉，而吴桂美的东汉文学求索，却似劲秋开镰，斩获颇丰。“史坛煌煌藏龙凤，文苑离离牧马牛。”这两句是说史书多写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然而你看那文苑才子，大都命运多舛如马牛走。“东西位定乾坤转，南北情迁风雅秀。”此联讲西汉东汉都城迁而风俗变，南北文化至东汉末已经完成了划时代的文学融合。“凭谁折取蟾宫桂”，是“蟾宫折桂”的化裁。古人谓文笔高方者是蟾宫折桂之人。此句勉励吴桂美拿出吴刚斫桂的精神，在学术研究的征途上再创佳绩。

栾 栋

2009年元旦于广州天河

目 录

绪论	(1)
一、学术史的回顾、评介与问题的提出	(1)
二、本书研究目的及基本思路	(8)
三、本书研究的时代断限	(11)
四、本书相关基本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13)

上 编

第一章 文教的家族化：士、士大夫、士族	(21)
一、春秋战国：从官府抛向社会	(21)
二、秦至武帝：从社会向官府的回归	(25)
三、西汉中叶以降：从士大夫到士族	(34)
第二章 家族的文教化(一)：素封豪族的士族化	(46)
一、素封豪族的形成	(47)
二、素封豪族身份的转变	(54)
三、素封豪族的文化士族化	(58)
第三章 家族的文教化(二)：皇门与外戚豪族的士族化	(64)
一、皇门豪族的士族化	(64)
二、外戚豪族的士族化	(71)

第四章 学术文学时代:东汉文学的存在方式	(83)
一、东汉文学的繁盛	(84)
二、东汉文学繁盛原因探析	(86)
三、东汉文学观念的变化	(95)
小结	(107)

下 编

第五章 东汉家族文学和文学家族的基本特征	(111)
一、东汉文学家族的基本概况	(111)
二、文学家族的文化教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115)
三、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基本特征	(119)
第六章 东汉文学家族个案研究(一):博陵崔氏	(125)
一、崔氏家族成员的生平行状	(125)
二、崔氏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	(134)
三、崔氏家族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169)
第七章 东汉文学家族个案研究(二):扶风马氏	(172)
一、马氏家族的世系渊源	(172)
二、东汉马氏家族成员的生平经历	(175)
三、从“遨游二帝”到“党附成讥”:马氏处世之道的变化及向 儒家士族的转变	(178)
四、马氏家族的文学创作	(185)
第八章 汉末:家族文学另一形态的存在和发展	(209)
一、东汉中后期至建安时期社会政治的变迁	(209)
二、汉末至建安时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211)
三、诗性精神的复归	(214)
四、建安时期文人的文学活动及文学观念	(217)

五、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新变·····	(219)
六、蔡氏、曹氏在家族文学史上的时代意义·····	(222)
小结·····	(235)
结语·····	(237)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53)

绪 论

一、学术史的回顾、评介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宗族或家族结构,一般来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基本的活动单位不是个人,也不是个体家庭,而是家族或宗族。中国又是一个注重文化传承的国度,家族对文化的传承和培养就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家族文学。家族文学生发于两汉,繁荣于魏晋南北朝,衰落于隋唐两宋,随着门阀世族制度的兴衰而兴衰。

论起家族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魏晋六朝。由于门阀世族制度的成熟和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文学尤其繁荣。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族,如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吴郡张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等等,这些家族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已经有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发表。著作如曹道衡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胡大雷的《中古文人集团》、丁福林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程章灿的《世族与六朝文学》、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萧华荣的《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传奇》、周征松的《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章义和的《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王

永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李伯齐的《簪缨世家琅琊王氏家族》等等。相关论文更是成果丰富,主要集中于魏晋六朝文学家族的个案分析,以及家族与当时文学互动关系的探讨等等。论文数量太多,兹不一一列举。

事实上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魏晋六朝家族文学的繁荣不是这一历史阶段突发之奇响,其前期积淀和萌生主要在两汉。尤其东汉,随着文化士族的形成,以及文学的日趋繁盛,东汉文坛已经出现了一些颇为有名的文学家族,家族历时之长、文学成就之高在家族文学史上颇可圈点,如博陵崔氏、扶风班氏、江夏黄氏、汝南应氏、弘农杨氏等等。汉代无论在制度意义上,还是文学意义上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此阶段的家族文学因其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位置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这些家族的家世渊源、生平行状和文学创作,无疑为汉代社会及其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仅可以因之去探求家族文学的产生机制和早期特征,家族文教与文学的关系,家族与社会的关系,从家族这个角度去把握东汉文学精神、豪族社会的结构特征及东汉的时代本质,还可以通过历史前后的联系比较探求家族文学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由此可见,汉代家族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但是学界对此却似乎有所遗漏。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学界直接切入东汉家族文学论题的研究并不多,只有少量研究成果。杜呈辉先生于1994年在《雁北师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班氏与晋北古代的文化发展》一文,探讨了班氏家族与汉代雁门郡文化之间的互动,看到了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不可分割的联系,眼光十分独特。徐宗文先生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四期发表的《崔为文宗 世祚雕龙——论东汉崔氏辞赋创作之特色及成因》,以及2004年10月于成都第六届国际辞赋学会上提交的《论班氏赋作的历史成就及特色》两文,分别从家族集团的角度对崔氏、班氏辞赋创作的特点及成因进行了研究分

析,发前人所未发。徐文主要着眼于辞赋研究,没有将探求视野进一步扩大到崔氏、班氏的其他文体创作,对于文学家族的整体研究而言颇为遗憾。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对魏晋六朝文学家族进行个案分析时将家族的兴起发展溯源至东汉,如曹道衡先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在论述北朝高门士族时,将崔氏、卢氏的历史追溯到东汉,透露出东汉已开始出现一些文学家族的信息。

对于东汉家族文学和文学家族直接或全面的系统论述和分析,学界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盲点现象。但是有一点我们又不可忽视,有大量文史资料,如文学史、文学论著、学术文章却论及到了东汉文学家族中的个别著名人物。如班氏家族中的班固、班彪研究;崔氏家族中的崔篆、崔寔研究;马氏家族中的马融研究;黄氏家族中的黄香研究;杨氏家族中的杨修研究;应氏家族中的应劭、应瑒研究等等。他们由于个人在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而受到人们的关注,研究论文颇多。这虽然不是家族文学研究,但是从点与面的关系上讲,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构建家族文学研究的必要材料,为家族文学的整体研究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因为家族文学既包括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文学实绩和特色,又包括具体家族成员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没有个体,就谈不上家族。虽然从文学家族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缺乏一种宏观统照的眼光,有些零碎,不成系统,但我们可以将之看作家族文学研究的滥觞和基础。

东汉家族文学缘何呈显出学术上的冷落?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在于东汉的文学家族没有魏晋六朝的显赫耀眼。士族在东汉刚刚形成,虽然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开始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势力还没有门阀政治制度下魏晋六朝的強大和稳固,缺乏“王与马,共天下”的显赫地位和政治成就,引起的关注就少了许多;其次,东汉家族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及魏晋六朝家族的显著和深远。魏晋六朝大多数文学家族不仅政治地位特殊,文学成就更

为斐然。如陈郡谢氏,一门五位公爵,其中作品轰动一时的文学家就有十多位,包括名传后世的大家谢灵运、谢朓和谢庄。谢氏家族不但能行善政,而且独步文坛,自然成为诸多学者研究阐释的对象。再看兰陵萧氏和彭城刘氏,仅《文选》和《世说新语》就让他们彪炳史册。而东汉文学家族除扶风班氏史学成就较为突出外,整体上考察缺乏巨匠和大师,这是家族文学处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

上述两点理由浅显易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因为东汉家族的创作多是政治应用性文体,而缺少纯文学性作品,就使现代学者在面对东汉家族文学时多少有些感到无所适从,可否将这些家族定位为文学家族,以及如何看待汉代文人文学就成为困扰研究者的首要问题。研究理论的不自信和研究态度的不明确无疑限制了东汉家族文学和文学家族的研究。这个问题关涉到我们进行汉代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有必要在此作适当的辨析。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大体可以“五四”为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五四”之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路与方法。文学研究属于一种大文学、泛文学或杂文学研究,也可称为经学研究,研究对象涵括了经史子集,十分广泛。到了20世纪初,这种传统文学研究的理论和观点,却受到了严重地冲击和重构。由于西方思潮的涌入,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文学”一词的内涵发生了极大变化。人们逐渐接受西方“纯文学”的观念,并以之为标准去衡量和指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但西学的浸入、西方文学理念和方法论的引入,给中国传统文学带来新变的同时,也使人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于传统习见大为缩小,而且由于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差异,当人们用今日“文学之为文学”的观念和尺度去衡量传统文学时,就出现了不少问题。如许多以前被人们称为文学的作品或文体,若用当今纯文学观念看来却很难归类,而若换一角度,这些作品或文体也蕴含着一定的审美意

味和独特的存在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颇多。因而在文学观念纯文学化的道路上走了快一个世纪的时候,学术界又开始呼吁重新用传统的文学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向杂文学、大文学或泛文学的研究方法回归。这是学术界一种很好地反思。但是我们又发现最近十年对文学研究及文学理论的反思其实仍然是追随西方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而发出的一种声音。

自“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研究逐渐走出封闭,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收着来自国外的理论与方法,西方观念的引入是对我国文学研究的一种激发促进或新角度的观照,但由于对西方理论大多总抱着一种趋同追随、削足适履的态度而失去了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今日依然如此。从“文学”这个词的学术来源看,是西方近代、特别是康德美学以及浪漫主义奠定了“文学”以审美为中心的文学概念,“文学”所指实际上成了纯文学、唯美文学的专称。当西方审美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术语的时候,我们尾随其后着力去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并且据此去做自家文学史、文论史的研究;而当眼下文化研究独领风气时,我们也随之改换标准,相应的去贬斥纯文学,简单地拔高杂文学、泛文学,毫无主见的盲目追随都使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陷入一种尴尬。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该何去何从?无论是以西方近代的文学概念为标准对古代文学进行剪裁取舍,还是回归于历史的文学概念忽略了文学的发展性而陷于保守,都会丧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独特性。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将文学的特征与中国文学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一种符合中国文学特点的全新文学理念,既能反映传统,又能看到新思想的影子。所幸的是现在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譬如栾栋先生近几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文学本质的文章,在这方面就有独特的